



# 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

## ——兼谈日本文学复古的走向

贾 飞

**摘要:**在日本江户时代,以荻生徂徕、服部南郭为代表的萱园派深受明朝后七子的影响,力倡文学复古,取法李攀龙和王世贞,但学界较少关注他们对王世贞的接受。实际上,基于共同的复古认知,从荻生徂徕的自著文集和所编选的其他人文集中均能看到王世贞的影响。荻生徂徕批判剽窃模拟之风,坚持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对象,追求源于真情的文学创作,使他最终醉心于踵武王世贞,而非李攀龙。其弟子服部南郭为宣扬文学复古而托名李攀龙编纂的《唐诗选》,促进了李攀龙在日本的传播,淡化了王世贞的影响,但此举并非荻生徂徕的本意。因此,对日本文学复古发展轨迹的全面认知,不能忽视王世贞的影响。

**关键词:**荻生徂徕;王世贞;李攀龙;文学思想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617

**收稿日期:**2023-01-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世贞诗文资料补辑与新论”(19FZWB010)、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项目“王世贞传”(19WMB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特别资助。

**作者简介:**贾飞,男,江西萍乡人,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E-mail: jiafei1507@163.com。

李攀龙和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对荻生徂徕及其引领的萱园派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直接关系到日本江户时代文学复古的走向。对于荻生徂徕的创作取法,学界多有研究,如强调他对李攀龙文学思想的接受<sup>①</sup>,以及由此对日本复古文学的影响,而王世贞对他的影响则只是偶尔被提及。李攀龙和王世贞虽然都为明朝后七子阵营的领袖,提倡文学复古,但是他们之间的文学思想存在一定差异性,这已被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所证实<sup>②</sup>。与之相适应,通过对荻生徂徕文集及其所编选他人文集的深入阅读和分析,我们发现荻生徂徕对剽窃模拟之风进行批判,坚持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对象,追求源于真情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接受了王世贞的文学思想,甚至达到了醉心于王世贞文学思想的地步。而在日本文学复古的发展轨迹中,《唐诗选》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导致了众人对李攀龙的推崇胜过王世贞,不过这并非荻生徂徕的本意。因此,对日本文学复古发展过程的全面认知,不能忽视王世贞的价值所在。本文试论述之。

### 一 基于共同的复古认知

王世贞(1526—1590)作为明朝后七子倡导文学复古的领袖之一,荻生徂徕(1666—1728)作为日本江户时代萱园派的创始人,大力倡导文学复古,虽然他们生活的国家和时代不一样,本没有交集,但是随着明朝书籍传入日本,王世贞和荻生徂徕之间便产生了相应的联系。他们不仅同为倡导文学复古的领袖,而且对于文

<sup>①</sup>学界已经关注到了荻生徂徕对李攀龙文学思想的接受。参见:刘芳亮《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46页;陈广宏《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66—74页。

<sup>②</sup>王世贞和李攀龙文学思想的差异性,历来被学界重视,如魏宏远在列举多种文献后,认为王世贞在复古之外追求“自然”境界,不同于李攀龙对古法的恪守;郑利华对王世贞和李攀龙的文学主张进行深入比较后,指出两人在学习古人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参见:魏宏远《从重“曹、韩遗迹”到“天厖万匹皆吾师”》,王世贞“自然”思想探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24—130页;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72—577页。

学复古之路的选择有着共同之处,这也增加了获生徂徕对王世贞的情感认知。

王世贞年少成名,二十二岁时就高中进士,再加上其显赫的家族背景,他自然成为各个文学团体都极力争取的对象。不过王世贞自身也喜好结社,如钱谦益曾言:“王元美初登第,即与(刘尔牧)结社。”<sup>①</sup>王世贞后来在大理寺结识李先芳,时常探讨诗文创作,并经李先芳和高岱的邀请,入其诗社。王世贞入刑部时,便受吴维岳、王宗沐等人的邀请,加入诗社,他曾在《艺苑卮言》中记载道:“明年为刑部郎,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袁履善等进余于社。吴时称前辈,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尝不击节称善也。”<sup>②</sup>在加入诗社后,他的创作获得众人认可,也增加了其创作信心。不过对王世贞影响最大的是李先芳介绍李攀龙与他认识,“久之,始定交。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sup>③</sup>。这让王世贞找到了创作方向,他曾自言道:“世贞二十余,遂谬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鳞,大悔,悉烧弃之。”<sup>④</sup>此即他心折李攀龙之论,并一改之前的创作风格。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世贞并不是盲目地跟随李攀龙从事文学复古创作,而是一种有着鲜明自我意识的自觉行径。首先,李攀龙和王世贞之间的关系构建源于平等对话,直至契合。王世贞追随李攀龙从事文学复古运动,并不是与之交谈一两次即达成共识,而是“久之,始定交”。如陈继儒所说:“王元美与李于鳞初为刑曹郎,相约读书,手抄《史记》二部。每相对饮酒,谈笑唏嘘,率若与子长相周旋。自是文章始有发癖。”<sup>⑤</sup>关于李攀龙对王世贞初期文学主张的态度,王世贞曾言及:“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盖日夜置心焉,铅槩之士,侧目谁何?独于鳞不以为怪,时有酬唱,期于神赏已耳。”<sup>⑥</sup>因此王世贞的文学主张和李攀龙有其内在的共通性,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盲目跟随。何诗海评价道:“这是一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成功合作。”<sup>⑦</sup>亦可见二人在文学复古中的平等合作关系。

其次,王世贞和李攀龙一起倡导文学复古,是建立在排除其他诗社基础之上的决定。王世贞在跟随李攀龙之前,已经加入了其他诗社,然而在结合自身的创作取向,以及其他诗社的主张情况下,便毅然离开了其他诗社。如当吴维岳知道王世贞的选择时,非常吃惊,并亲自前往理论,王世贞曾记载道:“(吴维岳)貽盛气欲夺我,不得,乃悟而折节,请正李。”<sup>⑧</sup>其实在这之前,王世贞对吴维岳的文学主张就颇有微词,他说:“先生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其独造盖有足多者。”<sup>⑨</sup>毗陵即唐顺之,乃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再加上吴维岳不能师古,这与王世贞的文学主张格格不入。因此,王世贞最终离开吴维岳的诗社,也是在所难免。

王世贞是源于内心的主动选择,走上了文学复古之路,且时刻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整体而言,明前后七子派的复古是诗取大历以前、文取西京以上,而这并不是终点,只是入学的法门,是通往上古诗文的跳板。由于时间、地域等原因,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滞后于中国文学,因此日本人在倡导复古之际,就多了明人这一个可供取法的对象。如祇园南海认为明诗是理解汉唐阶段的跳板,他直言:“汉唐之诗难学难解,明人之诗易学易解。……不如先读明诗之易成功耳。”<sup>⑩</sup>服部南郭则认为汉魏和唐诗都必须学,而“明人并兼之”<sup>⑪</sup>。明人之诗文,重点自然在于前后七子,如柳传震泽校刊《嘉隆七才子诗集注解》,濑尾维贤点校收集李梦阳、何景明及后七子诗作的《九大家诗选》,获生徂徕编选韩愈、柳宗元、李攀龙和王世贞的文章为《四家集》,等等。明人复古之学在日本大放光芒,对于获生徂徕而言,他走上复古之路,与王世贞有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此时的王世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435页。

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③王世贞《艺苑卮言》,第117页。

④王世贞《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刻本,第14页。

⑤陈继儒《朱批史记序》,《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年谱一卷》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53册,黄山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⑥王世贞《张助甫》,《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第14—15页。

⑦何诗海《王世贞与吴中文坛之离合》,《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74页。

⑧王世贞《明诗评后叙》,《凤洲笔记》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64页。

⑨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明刻本,第3页。

⑩祇园南海《明诗评序》,《明诗评》卷一,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日本享保六年(1721)刻本,第3页。

⑪服部南郭《序》,获生徂徕《唐后诗》第一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日本享保五年(1720)刻本,第6页。

贞是被学习者罢了。获生徂徕曾详细地自叙道：

不佞昔年消暑漫书，聊以自娱，本非以公诸大方君子，误坠剗，遂背本心。且其时，旧习未祛，见识未定，客气未消。自今观之，懊悔殊甚，忽承奖借，不啻泚颡。盖不佞少小时，已觉宋儒之说，于六经有不合者，然已业儒，非此则无以施时，故任口任意，左支右吾，中宵自省，心甚不安焉。随笔所云，乃其左支右吾之言，何足论哉，何足论哉？中年得李于鳞、王元美集读之，率多古语，不可得而读之，于是发愤以读古书，其誓目不涉东汉以下，亦如于鳞氏之教者。盖有年矣，始自六经，终于西汉，终而复始，循环无端，久而熟之，不啻若其口出，其文意互相发，而不复须注解。然后二家集，甘如啖蔗。<sup>①</sup>

对于复古，获生徂徕曾明确而简短地表达过自己的志向，如他所言：“不佞茂卿，自少小修文章之业，慨然有志乎复古，于是昭旷远览乎千岁，唯明李于鳞先生、王元美先生，则殆庶乎哉。”<sup>②</sup>在此不胜其烦地摘录获生徂徕的心路历程和实践道路，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其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全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知道获生徂徕受到了李攀龙和王世贞的双重影响，并按照李攀龙的诗文主张进行系统的古文学习，“如于鳞氏之教者”，也正因为如此，获生徂徕在以后的阅读中更加注重对古文的学习，“始自六经，终于西汉”，反复玩味，以最终达到一种自通自悟的状态。其实这种为学之道，恰恰是王世贞所奉行的，如他在指导后学徐孟孺写作时认为：“今宜但取《三百篇》及汉魏、晋宋、初盛唐名家语，熟玩之，使胸次悠然有融浹处，方始命笔。”<sup>③</sup>

再者，获生徂徕走上复古道路前，有着自身的文学主张，他是经过比较后，自主地选择复古道路。如其言，他中年时“得李于鳞、王元美集读之”，即获生徂徕不是以文学初学者的状态去阅读李攀龙和王世贞之作。受环境的影响，获生徂徕之前已经“业儒”，不过心生厌恶，李攀龙和王世贞之作让他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向。同样，获生徂徕也并非一时冲动而推崇李攀龙和王世贞，他说：“不佞固陋，少小修文章之业，辄不自揣妄意以谓诗不下开天，而文则西京以上，务自出杼轴，不循人墙下而走。唐唯韩柳，明唯王李，自此以外，虽欧苏诸名家，亦所不屑为，何况挽近乎？”<sup>④</sup>他还认为：“古言渐尽，而后韩愈出焉，是文之所以别古今也。明王李，距今仅百有余年，而不失其为古者，所学殊也。”<sup>⑤</sup>因此在经过仔细比较后，获生徂徕走向了李攀龙和王世贞，这和之前提及王世贞受李攀龙影响走上复古道路的心路历程极其相似。

可见，在对文学复古道路的选择上，王世贞和获生徂徕均不约而同地受到了李攀龙的影响，不过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内心追求真性情的自娱心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如王世贞在答友人周俎的信中说道：“于诗质本不近，而意甚笃好之，然聊以自愉快而已。”<sup>⑥</sup>获生徂徕亦言：“不佞昔年消暑漫书，聊以自娱。”<sup>⑦</sup>这就与李攀龙“仆愿居先开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sup>⑧</sup>，且一味法式古人的创作心态有所区别，同时为以后王世贞和获生徂徕走出李攀龙的文学藩篱埋下了种子，也为获生徂徕最终走向王世贞打下了认同基础。

## 二 《唐后诗》中的李、王之别

诚如鲁迅所言：“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sup>⑨</sup>而《唐后诗》是获生徂徕为宣扬其文学主张而编订的诗歌选集，通过此书，不仅可以近窥获生徂徕的诗学观，还能深入研讨获生徂徕对李攀龙和王世贞二人文学思想的认知。

对于该书的情况，获生徂徕多次在文集中提及，如：“不佞又选《唐后诗》、《汉后文》若干卷，其《唐后诗》、

① 获生徂徕《复安澹伯(又)》，《徂徕集》卷二十八，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日本元文元年(1736)刻本，第6页。

② 获生徂徕《与佐子严》，《徂徕集》卷二十五，第7页。

③ 王世贞《徐孟孺》，《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二，第16页。

④ 获生徂徕《与松霞沼》，《徂徕集》卷二十七，第11页。

⑤ 获生徂徕《与竹春庵》，《徂徕集》卷二十七，第16页。

⑥ 王世贞《答周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八，第19页。

⑦ 获生徂徕《复安澹伯(又)》，《徂徕集》卷二十八，第6页。

⑧ 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92页。

⑨ 鲁迅《选本》，《鲁迅全集》第七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39页。

庚集、辛集既付剞劂。”<sup>①</sup>并在《题唐后诗总论后》中认为宋元诗不足取后，交代了选编此书的原因，他说：“故今抄明诗，传之寒乡学者，使借是以识百年内外，亦有能游泳夫开元天宝之盛者已。”<sup>②</sup>即让广大学子知道开元、天宝之后，写诗尚有另外可取法的对象，其路径已经比李攀龙“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sup>③</sup>的主张开明不少。由此可知，《唐后诗》选编诗作的范围并不是唐朝之后的宋、元、明各朝，而是就明朝诗作而言，且此书并不是一次性选编后加以刊刻，应属于分批次刊刻。当然，《唐后诗》有其完整性，获生徂徕曾进行过完整的编纂，如他在与友人江若水的书信中言及：“九大家诗选奉返，《唐后诗》脱稿，足下与有力哉。”<sup>④</sup>

至于该书的具体情况，由于时代久远，及其分批次刊刻，以致在保存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造成目前没有完整版的《唐后诗》存世。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的《唐后诗》一书，是目前在日本所发现品质最好的版本，该书索书号为821-46，享保五年（1720）刻本，半页10行20字，每页下方均标有“武夷山藏”字样，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框高18cm×27cm。就内容而言，此书实为残本，如《唐后诗》的总目录有甲（古乐府）、乙（五言古诗）、丙（七言歌行）、丁（五言律）、戊（七言诗）、己（排律）、庚（五言绝句）、辛（七言绝句）、壬（杂体）、癸（本邦）十类，然而此书只有281页，且只存有庚集、丁集（上中下）、辛集（上下）三集。可喜的是，该书正文前有服部南郭的序，序的首页有印章三枚，藏书章为“瑞岩圆光禅寺藏书”、“帝国图书馆藏”，以及显示选购该书时间的印章为“明治三九·七·七·购次”，序后另有印章两枚，分别为“南郭”和“字余曰子迺”；还有《唐后诗总目录》，庚、丁、辛集均有详细的目录内容；以及获生徂徕所写的《唐后诗总论》<sup>⑤</sup>，从而可以断定该书为分批次刊刻中的某次全本。就书中所体现的李攀龙和王世贞之别而言，具体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唐后诗总论》所选之论而言，在形式上，获生徂徕总共选明人之论为48则，分别为胡应麟23则、王世贞15则、何景明1则、徐仲选1则、王敬美5则、范士楫1则、戴明说2则，且对于这些所选之论，获生徂徕说：“右诸公论，大抵尽明诗矣。”<sup>⑥</sup>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诸多诗论中，获生徂徕并没有选录李攀龙之论，他也不可能不熟悉李攀龙的诗学主张，而作为后七子派的领袖人物，李攀龙诗学之论不乏经典之语，如其提出的著名论断——“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sup>⑦</sup>，直接影响到后人对唐朝古诗及五言古诗的认知；再如他曾说“诗可以怨，一有磋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泥而不滓，蝉蜕滋垢之外者，诗也”<sup>⑧</sup>，注重诗歌创作和作者内心情感是息息相关的。

其次，在内容上，《唐后诗总论》所选之论48则有明显的分布规律，即按照历朝诗学总变之论到明代诗学总变之论，再具体到明代诗人的具体评论进行排列。其所选王世贞之论，均来自《艺苑卮言》的第五、六、七卷，即《艺苑卮言》集中论述明人诗学的有关章节。对于王世贞诗学的创作态度，获生徂徕通过所选他人之论进行了肯定，如他选胡应麟之论：“弇州《四部稿》……诸体毕备……王太常云：‘诗家兼大成，千古惟子美，今则吾兄。’汪司马云：‘上下千载，纵横万里，其斯一人而已。’”<sup>⑨</sup>即将王世贞放在历史的时空中观察，也是毫不逊色。虽然获生徂徕没有选李攀龙诗学之论，但是在所选诗学之论中不乏对他的评论，如借王世贞之口肯定李攀龙“才可谓前无古人”<sup>⑩</sup>，借王世懋之口称赞李攀龙“求似于情，而求胜于句，然则无差乎？曰：‘噫，于鳞秀。’”<sup>⑪</sup>。不过相对于这些肯定，所选之论中对于李攀龙评价更多的是批判，如获生徂徕选王世贞之论曰：“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sup>⑫</sup>选胡应麟之论曰：“于鳞七言

① 获生徂徕《与佐子严》，《徂徕集》卷二十五，第10页。

② 获生徂徕《题唐后诗总论后》，《徂徕集》卷十九，第18页。

③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8页。

④ 获生徂徕《与江若水》，《徂徕集》卷二十六，第13页。

⑤ 《唐后诗总论》所选诗论后有一篇完整的叙述文字，经对比，该整篇文章与《徂徕集》卷十九的《题唐后诗总论后》一文在内容上没有任何区别。

⑥ 获生徂徕《唐后诗总论后》，《唐后诗》第一册，第17页。

⑦ 李攀龙《选唐诗序》，《沧溟先生集》卷十五，第473页。

⑧ 李攀龙《送宗子相序》，《沧溟先生集》卷十六，第501页。

⑨ 获生徂徕《唐后诗总论后》第24则，《唐后诗》第一册，第9页。

⑩ 获生徂徕《唐后诗总论后》第21则，《唐后诗》第一册，第8页。

⑪ 获生徂徕《唐后诗总论后》第40则，《唐后诗》第一册，第14页。

⑫ 获生徂徕《唐后诗总论后》第19则，《唐后诗》第一册，第7页。

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实源流《早朝》、《秋兴》,李颀、祖咏等诗,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颀,属对多偏枯,属词多重犯。”<sup>①</sup>获生徂徕也和王世贞、胡应麟等人一样,不满李攀龙诗作过多的模仿,导致缺少自身原创及情感的表达。正因如此,获生徂徕不满自己得意弟子服部南郭对李攀龙的刻意学习,如其说:“曷不可,俾诵其(服部南郭)诗,则泱泱乎美哉盛也。体无所不具,材无所不博,盖刻意沧溟,而岂弟过之?”<sup>②</sup>即获生徂徕认为服部南郭通过刻意学习李攀龙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些成就的获得,有过犹不及之嫌,故而对其刻意学习李攀龙的行径抱有微词。获生徂徕还借胡应麟之口对李攀龙和王世贞诗学创作的高低进行了评判:“唐有工部、青莲,明则弇州、北郡,唐有摩诘、浩然、少伯、李颀、岑参,明则仲默、昌谷、于鳞、明卿、敬美。才力悉敌。”<sup>③</sup>与之相对,王世贞如杜甫,李攀龙如王昌龄,其中各自地位的高低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从《唐后诗》所选篇目来看,总共涉及作者 54 人,他们分别为王世贞、李攀龙、李梦阳、徐祯卿、何景明、吴国伦、刘基、高启、刘崧、袁凯、王谊、许廷慎、刘球、高壁、张宁、钱百川、边贡、薛蕙、孙一元、王廷相、唐顺之、徐中行、宗臣、谢榛、王世懋、杨基、林鸿、周玄、杨士奇、王洪、于谦、高叔嗣、王廷陈、杨慎、郑善夫、常伦、敖英、皇甫汭、乔世宁、高岱、汪时元、张佳胤、李化龙、卢柟、徐渭、胡应麟、赵玘、郭登、周在、王云凤、靳学颜、许邦才、李先芳、魏裳。从这些人物的生活时代来看,基本上明朝各个时期均有其对应的代表性人物,且这些人物集中在前后七子,甚至是追随后七子的王世懋、胡应麟也囊括其中。再从所选这些人物的诗作篇目来看,多于 6 首者,有王世贞、李攀龙、李梦阳、徐祯卿、何景明等 15 人,也是前后七子占据了主体,其中又以王世贞和李攀龙最多。可见,获生徂徕的复古学习态度非常明确,是取法前后七子,首推王世贞和李攀龙,以致均为明代重要诗学人物的袁宏道、钟惺,就不在获生徂徕的选取范围之内,他曾明确说道:“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长、钟伯敬诸家,慎莫学其一语片言,此学诗第一要法。但唐诗苦少,当补以明李于鳞、王元美等七才子诗,此自唐诗正脉。予近作《柏梁余材》,即是物也。”<sup>④</sup>“诗有东坡、文长、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种人物,以转盛趋衰,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sup>⑤</sup>即获生徂徕认为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作不仅不能作为后人学习的对象,甚至要在看到时退避三舍,而对于李攀龙和王世贞的诗作,却是推崇之至,为“唐诗正脉”,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获生徂徕所选王世贞五言绝句的数量超过李攀龙,五言律诗两人持平,均为 100 首,李攀龙的七言绝句则多于王世贞,据《沧溟先生集》统计<sup>⑥</sup>,李攀龙诗作为 1386 首,七言绝句的创作数量最多,为 332 首。在获生徂徕所选的庚、丁、辛集中,只涉及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三种文体。而据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统计<sup>⑦</sup>,其创作数量最多的是七言律诗,多达 919 首。虽然我们不知道获生徂徕所选七言律诗数量的具体情况,但如前所论,李攀龙相当于“七绝圣手”王昌龄,自然其七言绝句的创作水平较高,不过王世贞相当于杜甫,获生徂徕所选王世贞七言律诗的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很可能也多于李攀龙,且获生徂徕曾在看完友人之文时,欣喜地说道:“予所特爱者七言律歌行。”<sup>⑧</sup>从中可见获生徂徕对于王世贞和李攀龙,是按照诗学文体质量的高低进行选编,并非源于崇拜而刻意多选,因此,不能单凭所选李攀龙七言绝句数量多于王世贞,而断言获生徂徕更加推崇李攀龙。

由此可知,《唐后诗》中的李、王之别,着眼于李攀龙和王世贞各自创作的特点,更加客观地还原了获生徂徕对二人的接受,明确了获生徂徕的诗学取向,这也是日本文学复古的最初取向。

### 三 醉心于王世贞的自主选择

获生徂徕酷爱王世贞的墨迹,他在五十岁时,受友人左容惠翁赠送王世贞墨迹一幅,便写诗唱和以表内

① 获生徂徕《唐后诗总论后》第 22 则,《唐后诗》第一册,第 8 页。

② 获生徂徕《南郭初稿序》,《徂徕集》卷九,第 8 页。

③ 获生徂徕《唐后诗总论后》第 45 则,《唐后诗》第一册,第 15 页。

④ 获生徂徕《译文筌蹄言十则》,《徂徕集》卷十九,第 12 页。

⑤ 获生徂徕《题唐后诗总论后》,《徂徕集》卷十九,第 17 页。

⑥ 此次统计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的李攀龙《沧溟先生集》。

⑦ 此次统计依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五年《弇州山人四部稿》刻本。

⑧ 获生徂徕《与县次公》,《徂徕集》卷二十一,第 22 页。

心之喜悦,诗道:“吉光片羽忽从风,谓是遥来丹穴东。十二楼深仙子住,相思欲往路无穷。”<sup>①</sup>并且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言及:“凤洲之心画,遂得与其心声相从乎一堂上焉……千万不出相思二字耳矣。”<sup>②</sup>而心画、心声与诗心、文心实为一体,如王世贞曾言及:“夫诗,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sup>③</sup>因此,基于自身的文学素养及内心品性,获生徂徕在寻找学习对象时,选择了李攀龙和王世贞,而在对这二人进行全面的认知后,可以更好地理解获生徂徕对王世贞画作、墨迹的喜爱,以及对其文学主张的推崇,他还自言道:“吾醉心弇州。”<sup>④</sup>这种醉心于王世贞的自主选择,在文学思想的认同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批判剽窃模拟之风。文学复古在于向古人学习,注重通过法度、格调等手段去学习古人的创作方式,进而达到与古人相契合,以纠正时下文风的目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前人之作的模拟是必经阶段,这本无可厚非,不过一味地注重模拟古人,缺少自身情感的融入,将不利于文学的长远发展,也背离了文学创作的本意。李攀龙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故提出“拟议以成其变化”<sup>⑤</sup>的主张以救之,不过在具体的创作中,该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如钱谦益以“影响剽贼”<sup>⑥</sup>视他。对于剽窃模拟的看法,王世贞和获生徂徕是一致的,如王世贞直言:“剽窃模拟,诗之大病。”<sup>⑦</sup>获生徂徕直指:“近世学士家,弃蔑本艺,唯末流是沿,帖括剽窃,旁引佛老,语足以吓人,其稍自喜者,亦甘为欧苏奴隶,而不知《史》《汉》何物。”<sup>⑧</sup>如前所论,获生徂徕在《唐后诗》中借诸多明人之论,对李攀龙剽窃模拟的行径进行了批判。《乌生》是古乐府诗中的名篇,李攀龙、王世贞和获生徂徕均对此进行了模拟创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喙!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喙!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喙!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喙!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喙!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sup>⑨</sup>

黄口四五雀,罗坐秦氏桂树间。啄啄树上蠹,母子相哺自言安。喙我三河,不知为谁家?有轻薄少年,臂坐一鸱子,鸱子小小如人拳,出入雀东西。一纵即中两黄口,毛羽摧颓,魂魄飞上沧浪天。鸱子下来还少年。阿母生黄口时,乃在高堂楸庐间。喙我人民,安知雀乳处窈窕紫深宫中,安从通?白兔乃在平原大泽中,罗者尚复得脯腊之。喙我猛虎,斑斑南山间,射工尚复得枕藉之。明珠乃在合浦深渊中,后宫尚得剖以缀其襦。喙我人民,生各有寿命,何须尚复计会贤愚。<sup>⑩</sup>

乌生八九子,营巢高树颠。得食不充腹,置之咽嗉间。八九子,争向乌。力不能,任诸雏。毛羽剥落,皮骨憔悴尾毕逋。八九子,翼以肥,各自东西飞。老乌夜悲,啼血继之。八九子,争食喧野田,谁来念乌饥?乌且死,愿子莫生乌,但生泉与鸱。陛下仁圣,海宇咸庆,乌不返哺莫知故。<sup>⑪</sup>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家桂树枝。喙我秦氏家有美丽好女,工用双孔针五色丝,持针为人刺嫁衣,仰视乌叹咨。喙我颜色,即丑胜汝姿,汝任任意遨游求妃。阿母生阿女时,欲与贵人奇此女。喙我贵人,安知阿女处,闺房窈窕安从通?青雀乃在昆仑玄圃中,汉天子尚复得媒介之。喙我箫史仙白云霄间,弄玉尚复得追随之,神君乃在竹宫帷帐中,阿母尚得神君语。喙我人民生各各有欢娱愁苦,

① 获生徂徕《右谢王元美墨迹》,《徂徕集》卷六,第11页。

② 获生徂徕《与富春山人》,《徂徕集》卷二十二,第3页。

③ 王世贞《金台十八子诗选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五,第15页。

④ 获生徂徕《与富春山人》,《徂徕集》卷二十二,第2页。

⑤ 李攀龙《古乐府》,《沧溟先生集》卷一,第1页。

⑥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28页。

⑦ 王世贞《艺苑卮言》,第66页。

⑧ 获生徂徕《次公字叙赠行》,《徂徕集》卷十,第2页。

⑨ 古辞《乌生》,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8页。

⑩ 李攀龙《乌生》,《沧溟先生集》卷一,第14-15页。

⑪ 王世贞《乌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第10-11页。

何须计较早暮。<sup>①</sup>

从诗作可知,古乐府诗中的《乌生》是由乌母生子后被秦氏弹丸所杀而引发对寿命长短的叹息,从李攀龙、王世贞和荻生徂徕三人的模拟之作来看,李攀龙和荻生徂徕的诗作能够看出明显的模仿痕迹,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李攀龙只是将原作的部分字词进行了替换,如乌变成雀,弹丸变成鹞子,且行文的语意和情感都没有发生变化,真乃“临摹帖耳”。而荻生徂徕虽然行文句式没有较大的改变,不过文中内容却发生了大的变化,诗作讲的不是乌,而是生活中的母女,由寿命的长短转变为欢娱愁苦的早暮。王世贞所作则看不出模仿的痕迹,他不仅在形式上进行了改变,如其没有按《乌生》原来的句式,且在内容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写作对象也是乌,不过侧重点却在于对乌不反哺现象的痛斥,并上升到对社会的反思。通过对诗作的分析,我们也就更加清楚荻生徂徕为何屡次批判李攀龙的模拟之风,而没有言及王世贞。李攀龙曾对王世贞说道:“吾拟古乐府少不合者,足下(王世贞)时一离之,离者,离而合也,实不能胜足下。”<sup>②</sup>即李攀龙也折服于王世贞有自得之意的拟古乐府之作。

其次,取法不囿于秦汉和盛唐。廖可斌认为:“后七子的文学主张比前七子更趋僵化,李攀龙要负首要责任。”<sup>③</sup>的确,他所推崇的“秦、汉以后无文矣”<sup>④</sup>,以及后人殷士儋概括其文学主张时“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sup>⑤</sup>,都说明了李攀龙文学创作取法的狭隘。而王世贞虽然喜欢秦汉文、盛唐诗,但他不囿于此,如他叮嘱于臬先道:“足下且勿轻操觚,其诗须取李杜、高岑、王孟之典显者,熟之有得,而稍进于建安、潘陆、陶谢。文取韩柳四家平正者,熟之有得,而稍进于班马、先秦,其气常使畅,才常使饶,意先而法,即继之割然。”<sup>⑥</sup>荻生徂徕对李攀龙和王世贞的文学取法有深入的认知,以致在谈及具体的取法对象时,荻生徂徕甚至以王世贞之文学观来佐证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如荻生徂徕肯定他人在秦汉、唐朝之外有自身特色时,说:“先生盖明文衡山之流亚欤,温以粹,清而不窳,浏浏乎其美也。其诗虽不专唐,其文不攻秦汉,亦足以传矣。……夫弇州恶于不识衡山,因序其集,则古今事,固有相似者焉。乃先生之识余,而余不识也。”<sup>⑦</sup>这就跳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认知。

更为可贵的是,荻生徂徕在王世贞文学主张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他还注重学习者自身的本性,如他对友人竹春庵说道:“今观足下为人,温恭谦冲,恂恂似不能言者,洵洙泗之遗哉……若以不佞素所娴习欤,则莫若师古矣已。上焉六经,中焉先秦、西京,下焉明李王汪三家……明则沧溟凤鸾,弇州龙变,之二者,恐非足下资性所近,无已乎则汪公已,其文不尚奇,不喜辨,不诡随,不激昂,春容都雅,要以法胜,辟诸兵家节制之师焉。足下其能学诸,然古善牧马者,必先去其害马者,文章之道亦尔。”<sup>⑧</sup>荻生徂徕告诫竹春庵在面对众多可法式的古人时,不能全盘照搬吸收,而应该根据自己的秉性,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剔除不适合自己的,以提高学习效率。李攀龙和王世贞固然比汪道昆成就更高,但是他们的文章创作特点并不适合竹春庵的性格,而汪道昆却非常符合竹春庵的本性,是他该取法的对象。人的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并且是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因此荻生徂徕还强调:“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又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书》曰‘习与性成’,习之道亦大矣哉。”<sup>⑨</sup>正视学习者的本性,突出自我存在,而不是在古人面前消失自我。荻生徂徕的如此复古之论,实发前后七子之所未发,从而赋予文学复古新的内涵。

再次,对真情之作的追求。受李攀龙影响走上复古道路的王世贞,他内心的“性灵”火种并没有泯灭<sup>⑩</sup>,在第一次离开李攀龙南下途中所写的《初拜使命抵家作》、《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将军行》等作品,就与之

① 荻生徂徕《乌生八九子》,《徂徕集》卷一,第3页。

② 王世贞《书于鳞论诗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七,第20页。

③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④ 李攀龙《答冯通府》,《沧溟先生集》卷二十八,第766页。

⑤ 殷士儋《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志铭》,李攀龙《沧溟先生集》,第845页。

⑥ 王世贞《于臬先》,《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三,第3页。

⑦ 荻生徂徕《思靖遗稿序》,《徂徕集》卷八,第10-11页。

⑧ 荻生徂徕《与竹春庵》,《徂徕集》卷二十七,第13页。

⑨ 荻生徂徕《与数震庵》,《徂徕集》卷二十三,第2页。

⑩ 贾飞《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性灵说”的先驱》,《求索》2016年第11期,第138页。

前的复古之作有着本质区别,徐朔方更是直言:“当他暂时离开这位诗友而南下时,他的诗作就出现了另外的调子。”<sup>①</sup>即使在大力倡导文学复古,撰写《艺苑卮言》之际,王世贞仍注重创作时真情的流露,如他认为创作应该“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sup>②</sup>,并以王维创作为例说道:“凡为摩诘体者,必以意兴发端,神情傅合,浑融疏秀,不见穿凿之迹,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可耳。”<sup>③</sup>与之相同的是,获生徂徕在复古时也注重情的重要性,如他认为:“诗,情语也。”<sup>④</sup>并且批评汪道昆在选取古艺文者时,却不选韩非子文集,而“韩子之文,在周汉之间,炳彪如,亦尽乎情矣,古之遗也,故吾取诸艺文”<sup>⑤</sup>。除此之外,获生徂徕还进而追求文章之性灵,如其诗云:

郊园久辍五侯珂,忽拉儒宗复此过。泉石犹余经济大,咏歌应发性灵多。吾从孔孟论山水,人道泉夔在薛萝。总是德星今再聚,愿留照映被岩阿。<sup>⑥</sup>

整首诗作体现了获生徂徕的园林之乐,并充满留恋之情,同时发出诗歌创作该“发性灵多”,多抒写内心情性的感慨。这种对性灵的追求,与袁宏道认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sup>⑦</sup>的主张不同,却与王世贞将“性灵”回归到追求人之本性与社会和自然的合一有着相似之处,如王世贞认为:“山郁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广且清,而不悦吾之性灵哉。”<sup>⑧</sup>“诸所以黼黻泉石,娱快性灵者,种种来谕,谓发尚纯鬓,健啖雅步”<sup>⑨</sup>。因此在获生徂徕看来,诗文创作体现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而不是基于法度的文字堆积。郑振铎曾言:“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sup>⑩</sup>文学是基于人学基础之上的文学,要体现人类的情感,因此在复古之中,一味地尺寸古人而没有自身情性的流露,只会更加远离文学的本质。故而李攀龙使后七子的复古路径更加狭窄,王世贞和获生徂徕则推动了文学复古的新发展。

正是基于获生徂徕醉心于王世贞,对其文学创作及主张有着深入了解,因此在世人热议王世贞学盛唐或者苏轼时,唯有获生徂徕敏锐地认识到王世贞对白居易的喜爱,如其言:“弇州晚年枕藉长庆,而谢茂秦在七子中,独称异族。”<sup>⑪</sup>事实上王世贞在不同时期均有慕白行为,或仿效白体而作,或阅读《长庆集》后而作,或醉后之作犹带白家门风,以至于王世贞发出“生平雅慕乐天”<sup>⑫</sup>的感慨。所以结合王世贞一生的创作轨迹及情性主张,可以明确他是推崇白居易的<sup>⑬</sup>,这与获生徂徕之论相吻合。这种深刻的认知,是建立在获生徂徕对王世贞文集熟悉的基础之上的。如在他的文集中,不仅屡次提及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弇州山人四部稿》、《短长说》等书,还有“四部续稿”<sup>⑭</sup>,即《弇州山人续稿》,而王世贞的“四部续稿”以其晚年文集为主,多情性之作,光是他自己提及的性灵之处就多达11次,这是李攀龙、吴国伦等其他复古者不曾有过的。

#### 四 对复古走向的浅思

本文不是刻意地削弱或全盘否定李攀龙对获生徂徕的影响,而是在客观文献的基础上,发现获生徂徕在面对李攀龙和王世贞时,存在着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多维度接受。而造成后世认为日本复古文学多是受李攀龙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唐诗选》的盛行。

对于《唐诗选》在日本流传的具体时间,及其文本本身的真伪问题,学界历来争论颇多,莫衷一是,笔者支

①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苏州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②王世贞《艺苑卮言》,第15页。

③王世贞《艺苑卮言》,第57—58页。

④获生徂徕《答崎阳田边生》,《徂徕集》卷二十五,第5页。

⑤获生徂徕《韩非子会业引》,《徂徕集》卷十八,第8页。

⑥获生徂徕《六义园陪国子先生作》,《徂徕集》卷三,第14—15页。

⑦袁宏道撰、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⑧王世贞《古今名画苑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第22页。

⑨王世贞《胡观察伯安》,《弇州山人续稿》卷二百三,第19页。

⑩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⑪获生徂徕《与江若水》,《徂徕集》卷二十六,第9页。

⑫王世贞《宋画香山九老图》,《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八,第10页。

⑬贾飞《王世贞雅慕白居易胜论》,《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第181页。

⑭获生徂徕《与猗兰侯》,《徂徕集》卷二十,第9页。



持许建业之论,他认为《唐诗选》应为后人伪作,因为作为《诗删》的摘本《唐诗选》,其文章篇目应该不出于《诗删》,但《唐诗选》部分篇目却在《诗删》中没有,这不符合摘本的内在逻辑<sup>①</sup>。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作为李攀龙的挚友王世贞,在其文集中没有提及对《唐诗选》一书的评价,且在王世贞整理李攀龙文集的过程中,也没有提及,这有悖常理。鉴于这不是本文所论述的核心所在,再加上目前笔者也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故在此不过多讨论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推动《唐诗选》的传播并非获生徂徕,而是其弟子服部南郭。如服部南郭推崇《唐诗选》道:“唐诗莫善于沧溟选,又莫精于沧溟选。”<sup>②</sup>并且,“南郭所校订的《唐诗选》在享保九年(1724)由嵩山房刊行后旋即流行开来以至家弦户诵。据日野龙夫(1982)估算……江户时期的刊行数目依然近6万部”<sup>③</sup>,这在古代,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足以体现大家对《唐诗选》的认可,即使放到现在,这发行量也是较大的。

而对于《唐诗选》,在获生徂徕的文集中却仅仅出现过一次,获生徂徕认为:“诗以《唐诗选》、《唐诗品汇》为益友。”<sup>④</sup>不过事实却是,获生徂徕称之为“益友”的《唐诗选》,并不是后来流行的名为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他此时所阅读的《唐诗选》其实是江户时期流行的《唐诗训解》,为书商托名李攀龙、袁宏道的伪书,他在晚年时才认识到这一问题:“近来渐觉其非,而以《唐诗训解》代之,曰是于鳞先生之作。吁,于鳞岂有《训解》哉?”<sup>⑤</sup>

其实,获生徂徕对李攀龙的肯定主要是源于明后七子的“诗必盛唐”主张,而诗学盛唐是后人的一致行径,如宋人严羽屡次强调以盛唐为师,他认为:“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sup>⑥</sup>王世贞亦言:“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sup>⑦</sup>不过盛唐诗是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但并不是王世贞的唯一取法对象,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于诗大历而后者,阑入十之一,文杂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sup>⑧</sup>,因此他喊出了“诗不必尽盛唐”<sup>⑨</sup>的口号。诗可学盛唐,但不以盛唐为专,不局限于盛唐,亦是获生徂徕的诗学主张。

出于内心对王世贞的接受,获生徂徕在与他人提及李攀龙和王世贞,或者是自己在文中叙述时,不是千篇一律地以“李王”并称,而是多次以“王李”并称,除了之前引文中涉及的外,再如获生徂徕言及“昔大函氏,评王李二家”<sup>⑩</sup>、“七子为王李所自称”<sup>⑪</sup>。这正如刘虹在进行多次语言使用的实验后,认为语言态度代表了个人的取向,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有影响,他说:“这种影响不仅可以具有不同语言态度的人的言语差异中表现出来,也可以从同一个人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言语差异表现出来。”<sup>⑫</sup>从中可见获生徂徕对王世贞的真挚情感。

但不可否认的是,《唐诗选》的盛行,改变了李攀龙和王世贞在日本复古文学中的传播进程,这极大推动了民众对李攀龙的接受和认知,提升了李攀龙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不过随之而来的是王世贞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日本文学复古也走向了另外的方向。

概而言之,受李攀龙和王世贞影响而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获生徂徕,源于自身已有的情性之学,创作时

①许建业《伪托文化底下题李攀龙编〈唐诗选〉的文本生成与诗学意义——以〈唐诗选玉〉及〈唐诗训解〉为考察对象》,《励耘学刊》2016年第1期,第239—285页。

②早稻田大学編集部编《汉籍国字解全书》(第10卷),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3年版,第8页。

③刘芳亮《〈唐诗选〉在日本的流行及其原因再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2页。

④中村幸彦《近世文学论集·徂徕先生答问书》,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版,第172页。

⑤获生徂徕《与平子和(又)》,《徂徕集》卷二十二,第10页。

⑥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⑦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五,第6页。

⑧王世贞《答吴瑞谷》,《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八,第17页。

⑨王世贞《周叔夜先生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第20页。

⑩获生徂徕《与悦峰和尚》,《徂徕集》卷二十九,第1页。

⑪获生徂徕《与平子和》,《徂徕集》卷二十二,第10页。

⑫刘虹《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影响》,《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3期,第97页。

注重真情的体现,以及对剽窃模拟的批判,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使自己认同并推崇王世贞,而不是拘泥于李攀龙的文学主张,虽然后来在日本文学复古的发展轨迹中,人们更加推崇李攀龙,但不能否认王世贞的文学贡献。

## Acceptance of Wang Shizhen's Literary Thought by Ogyu Sorai: Also on the Trend of Japanese Retro Literature

Jia F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the Sorai School, represented by Ogyū Sorai and Hattori Nangaku,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Later Seven Maste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dvocated for literary revival,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Li Panlong and Wang Shizhen. However,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their acceptance of Wang Shizhen in academic circles. In fact, based on their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revival, the influence of Wang Shizhen in both Ogyū Sorai's own writings and the anthologies he compiled can be perceived. Ogyū Sorai criticized the trend of plagiarism and imitation, insisting on not limiting oneself to the models of the Q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ut rather pursuing literary creation based on genuine emotions. This led him to become deeply fascinated with Wang Shizhen instead of Li Panlong. Hattori Nangaku, his disciple, promoted literary revival by publishing a *Compilation of Tang poetry* attributed to Li Panlong, which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Li Panlong's influence in Japan while downplaying the impact of Wang Shizhen. However, this was no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Ogyū Sorai. Therefore,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jectory of literary revival in Japan, it is important not to overlook the influence of Wang Shizhen.

**Key words:** Ogyu Sorai; Wang Shizhen; Li Panlong; literary thought

[责任编辑:唐 普]